



學海一牛鳴

錢仲聯
著

清儒學術拾零

陈祖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5
)



學海一牛鳴

錢竹肥
著

清儒學術拾零

陈祖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儒学术拾零/陈祖武著.—2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6

(学海—牛鸣)

ISBN 7-5438-2091-9

I.清... II.陈... III.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IV.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179 号

责任编辑:莫金莲

装帧设计:陈 新

清儒学术拾零

陈祖武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2002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93,000

ISBN7-5438-2091-9
K·265 定价:20.50 元

编者的话

《学海一牛鸣》是一套学术著作丛书，专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空前活跃，并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套丛书旨在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学术园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繁荣。我们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数年的努力，出好这套丛书。

“一牛鸣”除字面一般意义以外，又为“一牛吼地”^{*}之简称，指牛鸣所及的距离。这套丛书兼取二者之义，凡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即犹如牛之一鸣，其声宏亮，必然飞震林樾，闻于远处。学海茫茫，添一新作，又说明著述者已向前跨越一新的里程。

蒙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为丛书题签，谨此致谢。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一牛吼地，梵语长度单位“拘卢舍”的意译。《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印度总述·数量》：“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

前 言

21 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即将翻过旧世纪的一章，迈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们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又为文明步履的滞后而忧虑。因此，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切实谋求中国文明的发展，就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一桩至关重要的事情。以下，拟就儒学与当代中国文明的关系，谈一些极不成熟的思考，权作本书前言，敬请各位批评指教。

一、关于儒学的经世精神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坚的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数千年的中国儒学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汇涓涓细流而成奔腾大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一磅礴伟岸的基本精神贯穿其间。儒学所具有的这种基本精神，不惟有力地推动了它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是使之对人类文明不断做出贡献的关键所在。

关于儒学的这种基本精神，《礼记》的《大学篇》有过一段集中阐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一“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表述，从个人修

持入手，直到经邦济世，概括了中国儒学自其形成时期所固有的基本精神。

这种精神发展到北宋，由著名思想家张载再度进行归纳，便成了四句很有名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而与张载同时略早的范仲淹，则把这种精神表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范二家的归纳，洋溢于其间的，依然是传统儒学人我一体、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明清之际的大动荡时代，终于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②的历史强音。正是在这样的声浪之中，孕育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杰出的学术大师和《明经世文编》等不朽的著述。鸦片战火燃起，直到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国儒学的基本精神融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历史洪流，伴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进而升华，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国数千年儒学的基本精神，后先一脉，愈阐愈深，宛若有一无形红线通贯其间。这种精神一言以蔽之，就叫做立足现实，经世致用。

在中国学术史上，各种学术形态的盛衰和更迭，环境不同，原因各异，未可一概而论。然而归根结蒂，无不以儒学经世精神的显晦升沉为转移。一种学术形态，如果能够立足现实，贴近现实，有效地解答社会现实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它就能够获得发展。反之，则失去生机。在这个问题上，宋明理学的兴衰，可视为一个典型。

理学在北宋中的崛起，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需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北宋，犹如人之年过半百，经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王朝频繁更迭，为了防止这一衰老势头的加速，适应国家大一统的需要，“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课题提上了历史日程。自唐中叶以来的数百年间，佛、道夺席，频频争先，尖锐的挑战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宋初的太祖、太宗至真宗年间，儒、释、道三家势力迭经消长，渐趋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形成以儒学为主干，融佛、道为一体的基本格局，于是理学应运而生。中经南宋

① 《宋元学案·横渠学案》。

② 意出顾炎武《日知录》，后经梁启超归纳。

初，朱熹总其成，而至元初大行于世。迄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再加发展，推向极端。隆庆、万历之后，数百年理学极度成熟而再变。明清更迭，实学思潮起，理学遂以“虚学”而成为学术界审视和批判的对象。理学因立足现实、切于世用而兴，亦因脱离现实、迂阔无用而衰，这便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存在。

立足现实，经世致用，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儒学不可撼动的脊梁。

二、关于儒学的历史特质

中国传统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并进，同中华民族的文明共存，确立了我们的国家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基本历史形象，赋予我们的民族以自强不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古往今来，伴随中华民族先民的迁徙以及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儒学早已逾出国界，超越民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儒学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特殊的历史地位，这除了蕴涵其间的前述经世精神之外，也是同它自身所具有的历史特质分不开的。

首先，中国儒学讲“修己治人”，是以谋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论究对象的学问。用孔子的话来讲，儒学追求的境界是“仁”，亦即尔后东汉经师郑玄解释的“相人偶”^①。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把一己同他人合为一体，谋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就是孔子为儒学确立的根本目标。无论是孔子说的“仁”，还是后世儒学大师加以发挥而提出的“修己治人”，它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间，既包括自身道德文化素质的修养和完善，同时也包括为他人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高和

① 《礼记·中庸》注。

② 《论语·雍也》。

完善。作为社会的成员，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换句话说，都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修己过程。而人们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不断调整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使之臻于和谐的过程。正是在这种不间断的完善和调整之中，人们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又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因此，修己与治人，彼此依存，相得益彰，足以成为人们终身追求的境界。可见，只要有人生存，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儒学便有它存在的历史价值。同样的道理，和平和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已成今日人们的共识。虽然谁也不能说未来的人类社会不会发生战争，然而如同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一样，战争毕竟是短暂的，它终究将为和平和发展所取代。因此，我们有理由这么说，实现和平和发展，不仅是当代世界的主旋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惟其如此，谋求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儒学，也就有了它存在的历史依据。

其次，中国儒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如同奔腾入海的黄河、长江一样，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也在不断地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在中国学术史上，儒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儒学，指的就是先秦时代，由孔子经子思到孟子的儒家学派及其学说。而广义的儒学，则不仅指先秦的儒家及其学说，而且更包括在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接受儒家学说影响而争奇斗妍的众多学说和学术流派。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儒学，恐怕就是从广义上来着眼的。事实上，倘若儒学仅仅是就先秦的儒家而言，而不是一个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学说，那么或许它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未必能引起今人如此浓厚的研究兴趣了。因此，从广义上说，不惟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属于儒学，而且早在儒学形成时期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和其后中国化的佛学以及道家学说，乃至晚近风起云涌的学术潮流，亦皆与儒学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

再次，中国儒学自成体系，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累，使之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鲜明的民族个性。中国儒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讲个人修持，

又讲社会和谐，还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乃至天文历法、方舆地志、医药博物、文学艺术，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可谓博大精深，无所不包。自西汉武帝以降，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以“崇儒重道”为基本国策，儒学深入朝野，成为制约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规范。众多儒学大师的主张，则通过典籍的传播和度藏，依经、史、子、集为类，汇为群书。经师、人师；名臣、名儒，两位一体，风范长存。上而尊于朝章国故，下而至于乡规民约，天下治乱，民风士习，无一不在儒学熏陶之中。儒学同国家、同社会、同民众生活的紧密结合，既使它获得了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同时又使它的民族个性磨砺日新。因此，古往今来，外来文明虽不断传入中国，儒学不惟没有失去其鲜明的民族性格，相反，则是兼容并蓄，融为我有，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民族个性。在这方面，诸如汉唐间佛学的中国化，明清之际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的会通儒学以传播西学，皆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三、关于促进中国文明发展的思考

当代中国文明的发展，面临着若干挑战。急功近利，金钱是求；贪污贿赂，舞弊营私；吸毒贩毒，求神信巫；等等，无一不在侵蚀中国的文明。如何改变这种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状况，促进中国文明的发展，已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化发展战略家，各色人等，都在为之设计蓝图。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作为一个以治中国传统经史为功课的读书人，我想借此机会，从学以经世的角度，谈几点迂阔之见。

第一，应当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国弱民贫，文明自然无从谈起，这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最近二十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社会大步前进的事实雄辩地证

① 《管子·牧民》。

明，正是有了这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今天来谈文明建设，方才可以脚踏实地，满怀信心。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经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是根本，断不可本末倒置。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也同时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状况改善了，绝不就等同于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会随之而自然提高。这就说明，经济建设成就又是不能简单地转化为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的。因此，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精神文明建设的艰巨性，要尊重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用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手段去处理其间的问题。何况发展经济并非只是一个单独的经济问题，从长远来看，脱离精神文明，甚至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谋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也实在是不可取的。

第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百年大计，绝非空话，应当从实际出发，力戒空谈，多做实事。在今日的中国，大凡受过一般教育的人论及文化问题，大概都会讲这么一句话，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究竟应当怎样去弘扬，又该弘扬些什么，则迄今没有一个定论。可见这还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无论对此持何种主张，都切不可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当做空话。否则连篇累牍，重复一千遍，口号毕竟还是口号，终究于事无补。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与其简单地去区分精华与糟粕的界限，倒不如从根本上去解决认识问题为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否正确地估计儒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边所述儒学的经世精神和历史特质，在在表明，中国儒学并没有终结，它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认为贬抑儒学是不妥当的，更不赞成否定儒学。假如我们能够以这样一个估计为立足点，去观察儒学，去认识儒学，去弘扬它的经世精神，进而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对它进行创造性的改造，那么儒学必将在促进中国文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反之，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走另一个极端，盲目推崇，而不去认真把握它的经世精神和历史特质，那么同样都是不利于推动中国文明前进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认识问题解决了，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做，弘扬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也就落到了实处。

第三，发展中国文明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以儒学为中坚的中国文明，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文明体系。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之所以历久不衰，至今依然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就在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创造性劳动，赋予中国儒学以久而弥新的民族个性。失去了这一民族性格，中国儒学就失去了生命，中国文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昭示了一条真理：要使中国文明永葆青春，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走自己的路。

关于中国文明的发展前景，已故钱宾四先生曾经做过有远见的展望。钱先生断言，未来的中国文明，“决不全是美国式，也决不全是苏俄式”。在这个问题上，宾四先生有一句至理名言：“跟在人家后面跑，永远不会有出路。”^①我服膺钱先生的卓见，认为当此世纪交替之际，惟有弘扬中国儒学的经世精神，推陈出新，精进不已，进而融域外文明之优秀成果为我所有，才是谋求中国文明发展的正确途径。

^① 钱宾四：《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目 录

前言	(1)
一、戴山南学与夏峰北学	(1)
(一) 孙夏峰笔下的刘戴山	(1)
(二) 戴山学北传的重要途径	(7)
(三) 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	(13)
二、《明儒学案》杂识	(17)
(一) 学案解题	(17)
(二) 《明儒学案》内容举要	(21)
(三) 编纂体例及其评价	(26)
(四) 《明儒学案》与《皇明道统录》	(30)
三、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	(34)
(一) 为学与为人相统一的一生	(34)
(二) 《日知录》述要	(38)
(三) 《日知录》的历史价值	(41)
(四) 黄汝成与《日知录集释》	(44)
(五) 李兆洛非《日知录集释》纂辑者	(47)
四、《双鹤瑞舞赋》考证	(52)
(一) 赋文试析	(52)
(二) 赋赠尚善说释误	(60)
(三) 历史的真相	(67)

五、明清更迭与华南知识界	(71)
(一) 袁崇焕与晚明政治	(71)
(二) 抗清斗争中的华南知识界诸英烈	(77)
(三) 屈大均的坎坷生涯	(82)
(四) 余论	(89)
六、从关中、漳南二书院看清初的关学与北学	(91)
(一) 李二曲与颜习斋	(91)
(二) 关中、漳南书院之比较	(93)
(三) 清初的关学与北学	(99)
(四) 清初书院的演进趋势	(103)
七、姚际恒与《仪礼通论》	(106)
(一) 姚际恒生平学行述略	(106)
(二) 《仪礼通论》管窥	(110)
(三) 顾颉刚与《仪礼通论》	(115)
八、清初江南三奇儒	(120)
(一) 费密与《弘道书》	(120)
(二) 从《衡书》到《潜书》	(128)
(三) 阎若璩与经史考据	(134)
九、《榕村语录》发微	(143)
(一) 《榕村语录》及其续编的成书	(143)
(二) 由《语录》看李光地为学大要	(146)
(三) 李光地学术宗尚的转变过程	(150)
(四) 知人论世的文献依据	(155)
十、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	(159)
(一) 乾嘉学派的形成	(159)
(二) 吴皖分派之商榷	(162)
(三) 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历史过程	(164)
(四) 地域学术与学派分野	(167)

(五) 汉宋学之争与乾嘉学派的衰微	(169)
十一、扬州诸儒与乾嘉学派	(175)
(一) 汪中的先秦诸子研究	(175)
(二) 焦循的经学思想	(179)
(三) 高邮王氏父子对乾嘉学术的总结	(184)
(四) 阮元与《皇清经解》	(188)
十二、赵翼与《陔余丛考》	(196)
(一) 赵翼生平学术行梗概	(197)
(二) 《陔余丛考》抄袭说辨析	(200)
(三) 《陔余丛考》的历史价值	(205)
十三、康熙乾时期的儒林与文苑	(209)
(一) 孔尚任与《桃花扇》	(209)
(二) 桐城初祖方苞	(219)
(三)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	(227)
十四、乾嘉时期的思想界	(236)
(一) 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	(236)
(二)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发微	(242)
(三) 焦循的经学思想	(247)
十五、孔子仁学与阮元的《论语论仁论》	(251)
(一) 《论语论仁论》杂识	(251)
(二) 阮元的仁学观	(255)
(三) 余论	(259)
十六、读《清学案小识》劄记	(263)
(一) 著者生平学术述略	(263)
(二) 全书内容举要	(266)
(三) 编纂体例及其评价	(268)
(四) 余论	(273)
十七、清中叶今文经学的复兴	(275)

(一) 庄存与和《春秋正辞》	(275)
(二) 几个承先后后的经学家	(279)
(三) 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	(286)
(四) 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289)
(五) 魏源通经致用的学风	(295)
十八、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300)
(一) 处女作《近世之学术》	(300)
(二) 《清代学术概论》的问世	(305)
(三) 从表彰戴东原哲学到结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309)
(四) 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	(315)
(五) 惋惜和商榷	(322)
十九、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326)
(一) 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	(326)
(二) 清儒考证学之来历	(331)
(三) 乾嘉诸儒吴皖非分帜	(336)
二十、《清儒学案》杂考	(341)
(一) 徐世昌倡议修书	(341)
(二) 夏孙桐与《清儒学案》	(344)
(三) 全书大要及编集体例	(350)
(四) 读《清儒学案》商榷	(359)
(五) 余论	(365)
后记	(366)

一、戴山南学与夏峰北学

明清之际的学术界，有两个很重要的学术群体，一个是江南以刘宗周为宗师的戴山南学，另一个是河北以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这两个学派与稍后的二曲关学鼎足而立，同主顺治至康熙间学术坛坫风会。因而雍正、乾隆间史家全祖望论清初学术，遂将戴山学传人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颀并举，而有“三大儒”之目。至于晚近学术界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清初三大儒，则时移势易，视角各别，未可同日而语。以下，拟就戴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之间的关系试做一些梳理，旨在据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明清间学术演进的脉络。

（一）孙夏峰笔下的刘戴山

明末清初的近百年间，是中国古代史中一个激剧动荡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卓越历史人物的时代。刘戴山和孙夏峰，就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杰出学术大师。他们以各自的学术实践，不惟开一方风气先路，而且影响所及，终清一代而不绝。

刘戴山名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以其居于戴山麓而尊为戴山先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得年68岁。孙夏峰名奇逢，

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学者以其晚年所居而尊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得年92岁。刘蕺山长孙夏峰六岁，两位是同一辈人。惟蕺山于明亡后绝食而逝，夏峰则离乡背井，依然在世三十余年。尽管蕺山生前，夏峰未得一睹丰采，但正是在蕺山故世后的三十余年间，随着夏峰与南北学者的过从日久，尤其是同蕺山学诸传人的数度往还，于是在他的笔下，高山仰止，追随恐后，则多见蕺山学行踪影。

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忧国忧民，志节耿然。明亡，东宫讲官刘理顺、兵部主事金鉉身殉社稷，金鉉即名在蕺山弟子之列。孙夏峰为文纪念刘、金二烈士，皆论及刘蕺山。所撰《刘文烈遗集序》云，天启间，刘理顺“与刘公宗周、金公鉉、吴公甘来，缙缙为斯道斯民忧”^①。而《金忠节公传》亦称：“刘宗周为少司空，尝就鉉论学，与陈龙正、史可法、朱之冯道德经济，互相劝勉。”^②对于刘蕺山的以身殉国，孙夏峰备极推崇。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他将刘宗周与方孝孺、高攀龙、鹿善继、黄道周等五人学行汇为一编，题为《五人传忠录》。夏峰于卷首有云：“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非谓其为读书种子乎？倪献汝叙历代理学，以黄幼玄为终，亦谓其忠孝至性，百折不回，真伟男子也。”^③同样的话，还见于夏峰为黄道周的《麟书抄》所撰序。他说：“刘念台先生序明理学，以正学为首。倪献汝序《理学宗传》，以石斋为终。……刘、倪二公，正谓其节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于理学无憾耳。”^④

①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四，《刘文烈遗集序》。

②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八，《金忠节公传》。

③ 孙奇逢：《孙徵君文稿三种》之二，《五忠录引》。

④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四，《黄石斋麟书抄序》。